

• 公行政學報 • 第五十五期

〈觀點對話〉

民107年9月 頁109-121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Doi: 10.30409/JPA.201809_(55).0004

臺灣縣市政府貪腐現象的再檢視： 以地方法院司法判決為例

吳重禮*

Corruption, some say, is endemic in all governments... a word should be said about causes to dispel any impression that corruption is a uniquely Afro-Asian-Latin American problem (Nye, 1967: 417-418).

壹、前言

政府貪腐是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發展的重要課題，該項議題在發展中國家更為凸顯；舉例來說，亞洲的韓國和菲律賓，中美洲的尼加拉瓜、瓜地馬拉、哥斯大黎加，以及非洲的薩伊、肯亞、奈及利亞、中非共和國等，皆曾經歷過嚴重的政府貪腐和國家領導人貪污和賄賂等問題（Roces, 2000: 182; Ruhl, 2011: 33-35; Seligson, 2002: 409-411; Shleifer & Vishny, 1993: 599-600）。政府貪腐風氣猖獗曾是臺灣政壇的一大弊端，迄今仍是社會各界廣泛批判的議題；若干研究指出，在不同時期，我國遭逢重大政府貪腐、官員貪污議題，導致政權動搖、政府更迭、族群衝突對立，甚至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的窘境（Chao & Myers, 1998: 125-126; Fell, 2005: 887; Meisner, 1977: 37; Templeman, Diamond, & Chu, 2016: 11; Tien, 1989: 4, 35-42）。

特約邀稿。

* 吳重禮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e-mail: polclw@gate.sinica.edu.tw。

儘管政府貪腐儼然成為政治學研究的關鍵議題，且為比較政治研究者經常提及概念，也累積了若干研究成果。必須說明的是，在多數研究著作中，政府貪腐問題並非探討的主軸，而是附屬在其他相關議題（譬如政治經濟發展、政府治理、利益團體、獨占或寡占市場的「競租行為」〔rent-seeking behavior〕、派系政治、制度選擇〔憲政制度、選舉制度、提名制度等〕）之中的一部分。究其原因，或許由於政府官員貪腐行為涉及相當程度的「敏感性」、「隱密性」與「道德性」問題，因此加深了研究的困難。細究諸多文獻著作，歸納而言，研究主軸環繞五個面向：其一，所謂「貪腐」的概念意涵為何？其二，究竟如何確切地測量「貪腐」概念？其三，影響政府貪腐的成因為何？其四，政府貪腐所導致的影響和對民主政治的戕害為何？其五，採行何種制度規範以防治貪腐行為（相關著作甚多，諸如 Alt & Lassen, 2008; Chang & Chu, 2006; Nye, 1967; Scott, 1969; Sun & Johnston, 2009; Van Roy, 1970；余致力、蘇毓昌，2006；吳親恩，2008；莊文忠、陳俊明、余致力、洪永泰，2011；廖興中、呂佩安，2013；蘇毓昌、胡龍騰，2013）。

《公行政學報》第 53 期刊登一篇精彩論文，由廖興中教授與徐明莉博士生（2017）所著〈臺灣地方政府貪腐現象之時空掃描〉，應屬於前述第二項爭議，亦即究竟如何確切測量政府貪腐的現象，尤其是否具有時間和空間的關連性。該文以 2006 年至 2012 年間臺灣各縣市政府公務人員的貪瀆起訴資料進行分析，研究資料顯示，地方政府貪腐傳染的現象並不明顯。為檢視相同研究議題，本文蒐集分析 2000 年至 2015 年期間縣市政府貪腐案件的地方法院判決，實證結果迥異於廖興中、徐明莉（2017）的研究發現，亦即地方政府公職人員貪污判決確實具有時間和空間的相關性。當然，該研究發現並非就此論斷，仍有待持續學術對話和探索，激發學者、學子對於不同研究視角的思考。

貳、理論觀點與研究方法

廖興中、徐明莉（2017：6-7）主要援引「社會互動論」（social interaction）觀點，其曾藉以檢視美國州政府間是否存在貪腐傳染現象（Goel & Nelson, 2007: 840）。貪腐傳染現象的可能成因，一方面在於各地域之間的商業活動已達到高度整合的程度，在這些密集商業互動的地區中，經由地方政府官員彼此學習、仿效與同儕影響，使得貪腐弊端發生機率更高。另一方面，空間「鄰近性」（proximity）亦有助於不同地區對彼此的瞭解，使得經濟或政治制度的安排，受到鄰近地區的影

響（Becker, Egger, & Seidel, 2009；轉引自廖興中、呂佩安，2013：40-41）。該文據此假設，相鄰地方政府之間的貪腐程度可能存在相似性，使得政府貪腐現象具有時間和空間的傳染性。

該文蒐集彙整 2006 年至 2012 年法務部電子佈告欄所公布，各地方政府公務人員每月貪瀆起訴案件統計資料，並利用主計處縣市指標資料庫中各縣市的公務人員數，計算貪瀆起訴人次比率（萬分率）。在統計模型中，作者亦納入地方政府貪腐現象的相關變數，包含政府規模、失業狀況、經濟狀況、居民教育程度等，以瞭解地方政府貪腐群聚現象是否因這些共變數而產生改變，藉以判斷哪些因素與貪瀆起訴的比率有關。

藉由 SaTScan 9.4 進行時空掃描統計，並以 ArcGIS 製圖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在 2008 年、2009 年、2012 年出現顯著起訴率較高風險的群聚縣市，包括新北市（2009 年）、高雄市（2008 年）、桃園縣（2012 年）、新竹縣（2012 年）、新竹市（2012 年）、苗栗縣（2012 年）、臺中市（2012 年）、南投縣（2012 年），以及臺東縣（2012 年）等區域。惟如是以觀，在時間與空間關連性方面，不同縣市的貪腐現象（貪瀆起訴人次比率）分布並沒有統計顯著的固定群聚出現。換言之，若以地方政府貪腐傳染的角度來看，高風險群聚區塊在不同時期分別聚集在不同的縣市，未有明顯持續且固定的現象。

個人正在執行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政治與司法：臺灣法院判決的政治影響與司法體系的比較評價」，該計畫採取量化與質性研究途徑，探討臺灣各級法院判決的政治影響與司法體系的比較評價。為了檢視臺灣地方政府貪腐現象是否具有時間與空間的相關性，本研究蒐集 2000 年 1 月起至 2015 年 12 月止，全國 21 個地方法院（包括臺北、士林、板橋、宜蘭、基隆、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臺南、高雄、花蓮、臺東、屏東、澎湖，以及福建省金門與連江地方法院），地方政府官員貪腐案件裁判文之實證資料，進行統計分析。¹

本研究資料主要取自「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並向司法院申請司法院網站裁判書查詢帳號；² 其他個人資料來自「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中央

¹ 目前我國共有 22 所地方法院，高雄市橋頭地方法院於 2016 年 9 月成立。

² 一般民眾得以在該法學資料檢索系統（<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查詢各級法院判決結果，但是因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緣故，只能取得去識別化資料（不含姓名、年齡、地址、聯繫電話等）。因此，本計畫基於學術使用理由，向司法院申請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網站裁判書查詢帳號，取得各級法院判別原始資料，藉此進行資料蒐集。

選舉委員會」，以及中央選舉委員會出版之《地方選舉實錄》。首先，透過司法院判例檢索系統，以關鍵字「貪污」、「瀆職」、「賄賂」、「侵占公共資金」搜尋裁判文資料庫。必須說明的是，一個案件可能同時有多名被告，本研究以一名被告為單位作為一筆資料。助理依據固定程序進行判決資料下載和編碼，經過交叉比對篩選，確認地方法院層級之縣市政府層級的貪腐案件被告人次共計 4,461 位。由於部份裁判文並未載明被告黨籍與職位，因此必須查詢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或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取得縣市議員以上選舉層級之候選人黨籍。

關於司法案件裁判文之編碼說明，本文以地方法院對於縣市政府貪腐案件的審判作為依變數，分析單位為案件的被告。在此，將依變數分為兩大類：「無罪判決」（簡稱「無罪」）與「有罪判決」（簡稱「有罪」）；而「有罪判決」又包括「宣判有罪，並不獲緩刑者」（簡稱「科刑」）與「判決有罪，但獲緩刑」（簡稱「緩刑」）。³ 兩階段分析模型之依變數皆屬於「二分變數」（dichotomous variable），因此統計方法採用「層狀勝算對數模型」（hierarchical logit model）。模型以統計軟體 Stata 12.0 進行資料檢定與分析。

在縣市別方面，本文以案件發生地點為單位，將各地方政府區分為六類：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澎、宜花東及金馬。在時間點方面，考量總統選舉因素，以每四年作為單位，區分為四類：2000 年至 2003 年、2004 年至 2007 年、2008 年至 2011 年，以及 2012 年至 2015 年。⁴

除了縣市別和時間之外，本研究另加入三項控制變數，分別是「政黨」、「被告身份」，以及「辯護律師人數」。在「政黨」變數方面，區分為「國民黨」、「民進黨」、「其他政黨」（包括親民黨、新黨、臺灣團結聯盟、建國黨、無黨團結聯盟、臺灣吾黨、綠黨），以及「無黨籍」；執行資料分析時，以「無黨籍」作為參照組。此變數為一「多名目變數」（multinomial variable）。

在「被告身份」方面，則區分為「政務官」與「事務官」，屬於「二分變

³ 依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法院審判之判決類型較本文提出的歸類更為詳細。必須說明的是，本文之所以採用此種歸類方式，理由有二：第一，法務部所公布之資料採取此歸類法；第二，此種歸類方式較為一般人所熟知，而刑事訴訟法所羅列之三級法院判決類型，非對法學有瞭解者不易得知其意。

⁴ 在縣市別和時間的變數處理方面，除了六分類和四分類之外，作者亦嘗試以個別縣市和每一年度作為變數納入分析。整體而言，其統計結果與既有數據頗為類似。關於資料處理，為節省篇幅，本文在此不擬詳盡陳述。對於資料分析和結果有興趣之讀者，請與作者聯繫，樂於提供詳細資訊。

數」。政務官包括地方民意代表、地方民選公職，以及地方政治任命官員。事務官則有地方委任公務員（1—5 職等）、地方薦任公務員（6—9 職等）、地方簡任公務員（10—14 職等），以及地方約聘僱人員。資料分析時，以「事務官」作為參照組。

在「辯護律師人數」方面，配合資料的特性，可區分為 0 至 3 等四類。依刑事訴訟法第 28 條的規定，被告在選任律師進行辯護，有人數的限制，最多以三人為限；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的規定，案件可分為強制辯護與任意辯護，後者案件是否有辯護人，需依被告之意願定之，故被告可以不用辯護人而自為陳述與辯護。就變數性質，此變數為可視為「連續變數」（continuous variable），亦可視為「多名目變數」；本文以後者方式處理，以次數最多的「1 位辯護律師」作為參照組。

之所以納入此三項控制變數，係基於「資源不平等理論」（resource inequality theory；亦稱為「訴訟能力理論」〔party capability theory〕）。簡言之，其意指司法訴訟過程，政治經濟資源豐厚者或社會地位較高者經常占有優勢，而資源匱乏者或者窮人階級往往無能為力（由於篇幅限制，在此無法詳述；建議參閱 Atkins, 1991; Dunworth & Rogers, 1996; Galanter, 1974; Songer & Sheehan, 1992; Songer, Sheehan, & Haire, 1999）。

參、實證研究分析

本文首先對於地方法院判決結果進行交叉分析，資料整理如表一所示。數據顯示，在黨籍方面，200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貪污案件判決中，被起訴者人數最多為無黨籍人士（3,993 人），其次是國民黨（432 人），再其次是民進黨（104 人）和其他政黨（23 人）。迥異於以往的社會刻板印象，這些數據顯示，並非除了國民黨籍和無黨籍人士之外，其他黨籍背景的候選人必然不會涉及貪腐行為，尤其是長期在野的民進黨，經常高舉「反貪腐」旗幟、以「清廉」自持；惟在派系主導經濟複雜的地方政治生態中，無黨籍和國民黨籍人物涉及貪污腐化行為的可能性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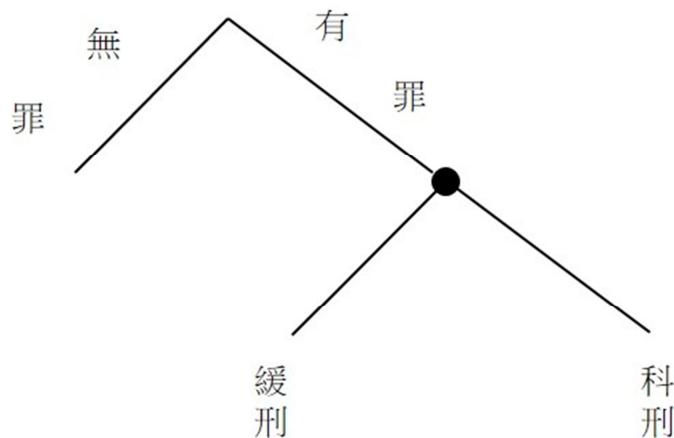
表一 地方法院貪污案件判決結果

單位：被告人數

		辯護律師人數								加總	
		0位（自行辯護）		1位		2位		3位			
		政務官	事務官	政務官	事務官	政務官	事務官	政務官	事務官		
國民黨	科刑	4	0	98	2	53	0	40	1	198	
	緩刑	0	0	14	0	3	0	1	0	18	
	無罪	4	0	110	4	47	1	50	0	216	
民進黨	科刑	0	0	21	0	8	1	16	1	47	
	緩刑	0	0	5	0	0	0	1	0	6	
	無罪	4	0	16	1	13	1	16	0	51	
其他政黨	科刑	0	0	2	0	5	0	1	0	8	
	緩刑	0	0	1	0	0	0	0	0	1	
	無罪	2	0	6	1	3	0	2	0	14	
無黨籍	科刑	4	19	210	559	76	236	44	144	1,333	
	緩刑	1	16	46	512	14	216	8	32	845	
	無罪	14	41	189	824	69	356	70	202	1,815	
	加總	33	76	738	1,974	291	811	249	380	4,46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文旨在檢視地方政府貪腐現象在時間與空間上是否有統計上顯著的固定群聚出現。此外，為了分析政治因素與地方政府貪污案件判決之間的關係，本文採用「層狀勝算對數模型」（建議參閱 Agresti, 1990; McCullagh & Nelder, 1989；黃紀，2000），其分析之順序，如圖一所示：亦即先分析涉案被告的黨籍歸屬、身份，以及辯護律師人數等因素，是否會使貪腐案件被告較易獲判無罪（無罪=1，有罪=0）；然後再就被判有罪之被告，進一步分析前述因素是否較易使其被判緩刑（緩刑=1，科刑=0）。



圖一 本文「層狀勝算對數模型」分析之順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二所示為地方法院無罪判決的勝算對數模型分析。實證資料顯示，被告的政黨歸屬、政務官或事務官身份等變數，對於依變數並不具有顯著的影響，其實證結果與研究預期並不相符。在辯護律師人數方面，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平均而言，被告聘僱三位律師進行辯護獲判無罪的「勝算比」（odds ratio；或譯為「成敗機率比」），是相較於聘僱一位辯護律師的 1.357 倍，這與一般社會預期頗為契合。在案件發生地點方面，相較於北北基地區，桃竹苗、雲嘉南，甚至高屏澎地區涉及地方政府貪腐議題時，被判無罪的機率較高，分別是 1.347 倍、1.341 倍，以及 1.248 倍。在判決年份方面，相較於 2000 年至 2003 年時期，在 2008 年至 2011 年和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間地方法院審理縣市政府貪腐案件時，有較高機率宣判為無罪。

接著，表三所示為地方法院緩刑判決的勝算對數模型分析，該迴歸分析顯示，在國民黨籍、政務官、聘僱三位辯護律師的被告與依變數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亦即，在其他條件不變情形下，平均而言，地方政府貪腐涉案的被告獲判緩刑的勝算，相較於無黨籍、事務官、聘僱一位辯護者，比較不會被判緩刑；此結果與一般社會刻板印象並不相符。至於在政府貪腐案件發生地點，相較於北北基，桃竹苗、雲嘉南、高屏澎地區涉及縣市政府人員涉及貪污行為時，地方法院被判緩刑的勝算比較低，分別是 .597 倍、.424 倍及 .526 倍。在判決年份方面，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相較於 2000 年至 2003 年期間，在其他三段時期，法院審理縣市政府貪腐案件時，有較低機率判決緩刑。

表二 地方法院貪污案件無罪判決之影響因素

	係數估計值 $\hat{\beta}$	勝算比 $\exp(\hat{\beta})$
政黨（對照組：無黨籍）		
國民黨	.112 (.122)	1.119
民進黨	-.137 (.216)	.872
其他政黨	.215 (.436)	1.240
被告身份（對照組：事務官）		
政務官	-.002 (.082)	.998
辯護律師人數（對照組：1位）		
0位（自行辯護）	.048 (.228)	1.049
2位	.071 (.074)	1.074
3位	.305** (.092)	1.357
案件發生地點（對照組：北北基）		
桃竹苗	.298** (.104)	1.347
中彰投	-.034 (.091)	.966
雲嘉南	.294** (.108)	1.341
高屏澎	.221 [†] (.115)	1.248
宜花東及金馬	.124 (.114)	1.132
判決年份（對照組：2000-2003年）		
2004-2007年	.097 (.082)	1.102
2008-2011年	.426*** (.081)	1.531
2012-2015年	.405*** (.094)	1.500
截距	-.639*** (.090)	.528
Log likelihood=-3013.964		
n=4,461 $\chi^2=84.58$ df=15 $p<.001$		

Notes: [†] $p<.1$; * $p<.05$; ** $p<.01$; ***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三 地方法院貪污案件緩刑判決之影響因素

	係數估計值 $\hat{\beta}$	勝算比 $\exp(\hat{\beta})$
政黨（對照組：無黨籍）		
國民黨	-.764* (.295)	.466
民進黨	-.183 (.459)	.833
其他政黨	-.693 (1.071)	.500
被告身份（對照組：事務官）		
政務官	-1.308*** (.144)	.270
辯護律師人數（對照組：1位）		
0位（自行辯護）	-.241 (.327)	.785
2位	-.109 (.109)	.896
3位	-1.045*** (.188)	.352
案件發生地點（對照組：北北基）		
桃竹苗	-.515** (.161)	.597
中彰投	.140 (.128)	1.150
雲嘉南	-.857*** (.184)	.424
高屏澎	-.642*** (.182)	.526
宜花東及金馬	-.170 (.167)	.844
判決年份（對照組：2000-2003年）		
2004-2007年	-.694*** (.122)	.500
2008-2011年	-.539*** (.125)	.583
2012-2015年	-.488** (.147)	.614
截距	.309* (.127)	1.362
Log likelihood=-1404.750		
n=2,512 $\chi^2=382.31$ df=15 $p<.001$		

Notes: [†] $p<.1$; * $p<.05$; ** $p<.01$; ***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綜合前述研究發現，這些實證數據蘊含著多重意涵。首先，在縣市政府貪腐案件的審理中，地方法院對於國民黨籍被告較可能裁定無罪判決，所謂「法院是國民黨開的」之觀感似乎有待商榷。⁵ 其次，在地方法院的政府人員貪污行為判決中，一般認知政務官員可能擁有司法優勢的觀點也未必完全正確。再者，猶如資源不平等理論所預期，在縣市政府貪腐案件判決中，相對於聘僱一位辯護律師者，有能力聘用三位辯護律師的被告（意味著社會經濟資源越豐厚者）確實較易獲判無罪。

另外，地方政府貪污議題是否具有時間和空間的相關性，這是本研究的主要關切。統計數據顯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在 2000 年至 2015 年期間，依據地方法院的判決結果，縣市政府涉及貪腐爭議訴訟，在空間與時間呈現統計上顯著的固定群聚現象。更具體地說，本文推論，在某些鄰近縣市和若干特定時間，發生地方政府貪腐行為的數量和頻率較為密集，因此法院採取有罪、無罪和緩刑判決的機率呈現顯著差異。相當程度而言，本文實證資料顯示，不同於廖興中、徐明莉（2017）的論述觀點，此研究發現似乎意味著，臺灣各縣市政府公職人員的貪瀆現象似乎有其感染性和集中性。

對於這樣的研究結論，筆者認為有兩點必須補充說明。其一，本文和廖興中、徐明莉（2017）蒐集彙整不同資料來源、統計數據時間起迄不一致、研究方法和分析途徑有所區別，因此彼此的研究結論亦未盡相同。其二，就研究方向而言，在足夠分析樣本的前提下，可嘗試將「交互變數」（interactive variables 或者是 multiplicative terms）納入分析模型中，尤其是「案件發生地區」與「判決年份」的「結合效應」（joint effects），以利進行比較分析。⁶ 無疑地，貪腐議題仍有寬廣的研究空間，值得學界的持續關注。

⁵ 關於國民黨與司法的互動關係，一項頗受訾議的事件發生在 1995 年 7 月份，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許水德，參加高屏澎 14 全黨代表分區座談會時，屏東縣籍省議員余慎、高雄縣籍省議員鍾紹和、澎湖縣籍省議員許素葉等黨代表，針對法務部長馬英九積極查察賄選行動大感不滿，措詞激動直批中央黨部，許水德好言相勸，並以「法院也是執政黨的」安撫黨代表不滿情緒（楊和倫，1995：25）。

⁶ 理論上，使用交互變數的目的在於評估兩個自變數之間對於依變數所產生的交互效應。由於許多政治現象具有複雜性，某一項自變數對於應變數的影響，往往因為其他變數影響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為了瞭解兩個自變數對於依變數所產生的交互效應，故以兩個自變數的乘積處理之（交互變數的特質與運用，可參閱 Friedrich, 1982）。

參考書目

- 余致力、蘇毓昌（2006）。國家廉政體系的建構與測量。*研考雙月刊*，**30**（6），44-54。Yu, Chi-Lik & Su, Yu-Chang (2006). Guo jia lian zheng ti xi de jian gou yu ce liang [The construction and measurement of a 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Bimonthly*, **30**(6), 44-54.
- 吳親恩（2008）。地方議會金權政治的變化：司法判決書的分析。*台灣政治學刊*，**12**（2），165-212。Wu, Chin-En (2008). Di fang yi hui jin quan zheng zhi de bian hua: Si fa pan jue shu de fen xi [The evolution of money politics in the local assembly: An analysis of verdict].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2**(2), 165-212.
- 莊文忠、陳俊明、余致力、洪永泰（2011）。地方政府廉政指數，載於余致力（編），*廉政與治理*（61-85 頁）。臺北：智勝。Juang, Wen-Jong, Chen, Chun-Ming, Yu, Chi-Lik & Hung, Yung-Tai (2011). Di fang zheng fu lian zheng zhi shu [Integrity index for local government]. In Yu, Chi-Lik (Ed.), *Lian zheng yu zhi li [Integrity and governance]* (pp. 61-85). Taipei: Best-Wise Press.
- 黃紀（2000）。質變數之計量分析，載於謝復生、盛杏湲（編），*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387-411 頁）。臺北：五南。Huang, Chi (2000). Zhi bian shu zhi ji liang fen xi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variables]. In Hsieh, Fu-Sheng & Sheng, Shing-Yuan (Eds.), *Zheng zhi xue de fan wei yu fang fa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387-411). Taipei: Wunan Publishing.
- 楊和倫（1995）。許水德語出驚人：法院也是執政黨的！*新新聞周刊*，**437**，25。Yang, He-Lun (1995). Xu shui de yu chu jing ren: Fa yuan ye shi zhi zheng dang de [Xu, shui de's language is amazing: The court is also the ruling party]. *The Journalist*, **437**, 25.
- 廖興中、呂佩安（2013）。臺灣縣市政府貪腐現象之空間自相關分析。*臺灣民主季刊*，**10**（2），39-72。Liao, Hsin-Chung & Lu, Pei-An (2013). Tai wan xian shi zheng fu tan fu xian xiang zhi kong jian zi xiang guan fen xi [A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corruption of counties in Taiwa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0**(2), 39-72.

- 廖興中、徐明莉（2017）。臺灣地方政府貪腐現象的時空掃描。*公共行政學報*，53，1-23。Liao, Hsin-Chung & Hsu, Ming-Li (2017). Tai wan di fang zheng fu tan fu xian xiang de shi kong sao miao [A spatial-temporal scan on the corruption of counties in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3, 1-23.
- 蘇毓昌、胡龍騰（2013）。誰能容忍貪腐？。臺灣民主季刊，10（2），1-38。Su, Yu-Chang & Hu, Lung-Teng (2013). Shei neng rong ren tan fu? [Who can afford to tolerate corruptio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0(2), 1-38.
- Agresti, A. (1990).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New York, NY: John Wiley and Sons.
- Alt, J. E., & D. D. Lassen (2008). Political and judicial checks on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American state governments. *Economics & Politics*, 20(1), 33-61.
- Atkins, B. M. (1991). Party capability theory as an explanation for intervention behavior in the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4), 881-903.
- Becker, S. O., P. H. Egger, & T. Seidel (2009). Common political culture: Evidence on regional corruption contag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5(3), 300-310.
- Chang, E. C. C., & Y. H. Chu (2006). Corruption and trust: Exceptionalism in Asian democracies? *Journal of Politics*, 68(2), 259-271.
- Chao, L., & R. H. Myers (1998). *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 Political lif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unworth, T., & J. Rogers (1996). Corporations in court: Big business litigation in U.S. federal courts, 1971-1991. *Law & Social Inquiry*, 21(3), 497-592.
- Fell, D. (2005). Political and media libe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184, 875-893.
- Friedrich, R. J. (1982). In defense of multiplicative terms in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4), 797-833.
- Galanter, M. (1974). Why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Speculations on the limits of legal change. *Law & Society Review*, 9(1), 95-160.
- Goel, R. K., & M. A. Nelson (2007). Are corrupt acts contagiou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9(6), 839-850.
- McCullagh, P., & J. A. Nelder (1989).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2nd ed.).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 Meisner, M. (1977).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 Nye, J. S. (1967).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2), 417-427.
- Roces, M. (2000). Kinship politics in post-war Philippines: The Lopez family, 1945-1989. *Modern Asian Studies*, 34(1), 181-221.
- Ruhl, J. M. (2011).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central America: Assessment and explanatio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53(1), 33-58.
- Scott, J. C. (1969). Corruption, machine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4), 1142-1158.
- Seligson, M. A. (2002).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regime legitima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tics*, 64(2), 408-433.
- Shleifer, A., & R. W. Vishny (1993). Corrup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3), 599-617.
- Songer, D. R., & R. S. Sheehan (1992). Who wins on appeal? Upperdogs and underdog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of Appea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1), 235-258.
- Songer, D. R., R. S. Sheehan, & S. B. Haire (1999). Do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over time? Applying Galanter’s framework to decisions of the U.S. Courts of Appeals, 1925-1988. *Law & Society Review*, 33(4), 811-832.
- Sun, Y., & M. Johnston (2009). Does democracy check corruption? Insights from China and India. *Comparative Politics*, 42(1), 1-19.
- Templeman, K., L. Diamond, & Y. H. Chu (2016). Taiwan’s democracy under Chen Shui-Bian. In Y. H. Chu, L. Diamond, & K. Templeman (Eds.), *Taiwan’s democracy challenged: The Chen Shui-Bian years* (pp. 1-28).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Tien, H. M. (1989).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Van Roy, E. (1970). On the theory of corrup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1), 86-110.

